

# 晚清人物叢考

二編

戴海斌 著

禮部見  
世謂乃知老僕識力猶曩日也  
今危迫極矣以一弱敵八強  
雖而千古憤而萬國云子理  
勢若不投函抵牾起外侮度  
外洋事同其處信歸未作

采銅文丛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非外傳

戴海斌 著

晚清人物叢考

二編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人物丛考/戴海斌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9

(采铜文丛)

ISBN 978-7-108-06398-4

I. ①晚… II. ①戴… III. ①人物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K82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5141 号

## 二编 目录

|     |                     |
|-----|---------------------|
| 355 | 庚子年李鸿章北上史实补正        |
|     | ——兼论李鸿章与日本的关系       |
| 356 | 一、奉召前夕动向——兼释北上诏令的性质 |
| 362 | 二、欲走还留              |
| 366 | 三、“水鸟外交”：周旋于日、俄之间   |
| 372 | 四、“难入津门”：滞沪不行的多种阻力  |
| 377 | 五、杨崇伊北上密谋及其日本背景     |
| 383 | 六、简短的结语             |
| 385 | 附 李鸿章与佐佐友房谈话记录      |
| 390 | “误国之忠臣”？            |
|     | ——再论庚子事变中的李秉衡       |
| 392 | 一、巡阅长江水师            |

- 397 二、信拳？剿拳？
- 406 三、拒阻英舰入江
- 410 四、奉召北上
- 414 五、二李之“争”
- 422 六、结语：“误国之忠臣”？

## 427 种族与政治：晚清宗室寿富之死及其回响

- 427 一、从《绝命词》说起
- 428 二、寿富其人及家世
- 433 三、戊戌前后
- 440 四、殉难始末
- 448 五、谁问身后事
- 455 六、种族与政治双重视野中的寿富之死

## 463 “援匹夫有责之义，贡千虑一得之愚”：庚子事变中的张元济

- 464 一、栖处“南洋”
- 468 二、倡议“维持东南大局”
- 472 三、为“统筹全局”建言献策
- 479 四、余论

## 483 “互保”“换旗”与“公共政府”

——再论“东南互保”时期的郑观应

- 485 一、“换旗”交涉始末
- 496 二、政治建策的意义与限度——从两件新史料来看
- 507 三、结语

|     |                                                     |
|-----|-----------------------------------------------------|
| 510 | 余联沅：从“铁面御史”到“洋务干员”<br>——上海道研究的一个个案                  |
| 511 | 一、京官生涯                                              |
| 516 | 二、上海道任上(之一)：涉外人际交往的若干<br>线索                         |
| 522 | 三、上海道任上(之二)：“东南互保”中的真实<br>角色                        |
| 539 | 四、结语                                                |
| 544 | 陶森甲：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双面人”                                  |
| 545 | 一、陶森甲其人                                             |
| 549 | 二、与日本的渊源                                            |
| 555 | 三、庚子事变中的表现                                          |
| 566 | 四、结语                                                |
| 568 | “两收海军余烬”：甲午、庚子时期沈瑜庆事迹<br>钩沉                         |
| 569 | 一、“哀余皇”之内面                                          |
| 574 | 二、与议“东南互保”                                          |
| 581 | 三、收容北洋海军                                            |
| 587 | 四、余话                                                |
| 590 | “上海中外官绅”与“东南互保”<br>——《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笺释及“互<br>保”“迎銮”之辨 |
| 592 | 一、发自上海之倡议                                           |
| 604 | 二、游说刘、张诸情节                                          |

- 623 三、出位之思：“互保”“迎銮”辨
- 628 四、余论
- 635 “题外作文、度外举事”与“借资鄂帅”背后  
——陈三立与梁鼎芬庚子密札补正
- 636 一、“题外作文”与“东南互保”系同一时期产物
- 640 二、“陶观察之说词”的日本背景
- 646 三、张之洞之于“勤王”的反应
- 652 《王湘绮年谱》辨误一则  
——兼论庚子前后王闿运的思想动态
- 653 一、庚子正月王闿运不可能在杭州见梁启超
- 655 二、庚子六月梁启超曾短暂回国
- 659 三、王闿运对于庚子事变的观感
- 666 四、结语
- 669 张佩纶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幕  
——辛丑议约期间复出史实考论
- 670 一、复出非由李鸿章主动奏请
- 673 二、奉召后的最初反应
- 675 三、张佩纶书札所见之庚辛时局
- 682 四、离京回宁的真实原因
- 687 五、结语
- 691 “志士”与“离心”：庚辛之际趋新士人的时局  
因应  
——偏于“言”的部分

|     |                |
|-----|----------------|
| 694 | 一、南北分野与新旧殊途    |
| 699 | 二、“互保”面面观      |
| 707 | 三、“借权督抚”：层次与限度 |
| 726 | 四、内省的民族主义      |
| 736 | 五、余论：迎接“帝国的时代” |

|     |            |
|-----|------------|
| 749 | 附录 原发表出处一览 |
|-----|------------|

# 庚子年李鸿章北上史实补正

## ——兼论李鸿章与日本的关系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李鸿章（1823—1901）去世前一年，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将这位晚清重臣由偏处岭南的两广总督任上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演出其政治生涯的谢幕之作。李鸿章奉旨应召，由广州航海北上，在上海停留观望将近两月，然后才就道入京，收拾中外战争的残局。有关李鸿章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相关传记著作以及专题论文已有过不少研究<sup>①</sup>，而他之于“两广独立”“东南互保”等重要事件的复杂关系，也不乏广泛讨论<sup>②</sup>。李鸿章临危复出的表现，实际上极大受制于外部环境的变动，而他在多种政治势力包围下依违徘徊的举止与顾盼摇曳的情态，尤其值得瞩目。有关李鸿章北上一行的研究，似已剩义无多，不过，如果对史料进行更为深入的爬梳，并且扩大视野，将中外两边资料合而观之，仍能够发现一些原不为人所注意、但未必不重要的面相，而既有论述也有值得推敲的地方。本文的补正工作，希望对李鸿章这一人物以及庚子事变时期

① 苑书义：《李鸿章传（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04，第466—492页。翁飞：《试论义和团时期的李鸿章》，《安徽史学》1991年第1期。李欣霏：《李鸿章在〈辛丑条约〉谈判前滞留在沪原因初探》，《长春师范学院学报》第23卷第5期，2004年9月。保田善丈：《李鸿章北上をめぐる諸対応——清末中国の中央地方関係とイギリスの対中政策》，《史潮》通号33—34，1993年11月。

② 陈勇勤：《论1900年庚子事变中的李鸿章》，《安徽史学》1991年第3期。董丛林：《李鸿章对“两广独立”的态度与庚子政局》，《河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苑书义：《庚子孙李关系与中国政局》，《河北学刊》1997年第2期。永井算巳：《东南保護約款について——日中関係史料よりみたる》，《中国近代政治史論叢》，汲古書院，1983。

内政、外交互动关系的理解有所裨益。

## 一、奉召前夕动向——兼释北上诏令的性质

戊戌以后，李鸿章以“投闲之身”重获起用，相继奉办履勘山东黄河工程、考察通商各埠商务等差使，继而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99年12月19日）外放两广，署理总督一职。临行前夕，他致友人的道别信中纠结了一种复杂的情绪：

兄以颓龄，忽奉边寄，当此海疆多事，臣子之谊，何敢惮行？朝旨敦促甚殷，拟于腊初出京，由秦王岛登舟……仍即取道上海，前赴香港。日暮途远，浩若望洋，一息尚存，不敢不勉。<sup>③</sup>

政治生命虽然得以延续，但在僻远的岭南一隅，李鸿章的心情并不十分舒畅：慈禧太后的宠顾已不复昔日之殷，正在京中得势的载漪、刚毅一流更非政治上的同路人，而在广东，因处置“平毁康逆坟墓”一事态度暧昧，饱受朝野非议，粤地“匪乱”频发、缺兵少饷也成为一桩棘手的心病。他在写给儿子的家信里大吐苦水，对比同僚，抒遣抑郁，情调即倦且怨：“时事艰极，吾年高膺此重寄，徒增焦烦，不知岷庄（刘坤一字岷庄）何以大耐官职也？”<sup>④</sup>如照惯有轨迹发展，李鸿章大概也已接受终老岭南的命运安排。然而，万千拳民在华北乡村迅猛崛起，震撼人心的喊杀声搅动半个中国，遥远的海疆也不复平静，原本将归于平淡结局的人生再次发生转折，对其个人言，不知是幸或不幸？

在政治层面，李鸿章对义和团最早有所注意，时间约在五月中旬。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由北京发出的告急电后，他选

③ 参看雷禄庆编：《李鸿章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第611页。

④ 《致李经方》，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60页。

择立即转电总署请代奏,五月十四日(6月10日)发文如下:

总税务司赫德今晨来电称:京城局势危险已极,各使馆甚虞被击,均以为中国政府若非仇视外人,即系无力保护,倘稍有不测,或局面无速转机,各国必定并力大举。中国危亡即在旦夕,应请中堂电奏皇太后,务须将各使馆保护万全,并宣明凡有臣工仇视洋人之条陈,朝廷必不为所谣惑云云。事关紧急,不敢壅于上闻。请速代奏。<sup>⑤</sup>

电奏中并未直接表述立场,而是引述外人语,以“事关紧急”暗示改弦易辙的必要。当时粤海关税务司庆丕(Paul King)多次奉命往访,李鸿章的谨慎令其印象深刻:“无论李鸿章心里怎样想,他外表上一点不露对于当前局势的看法。此间情况直到现在为止,可以说一切平静。”<sup>⑥</sup>如论者所言,事变之初,李鸿章表现出“一个在清王朝内政外交核心圈子里混迹多年的老官僚的政治敏感”<sup>⑦</sup>。他在广州听说慈禧太后派刚毅(1837—1900)、赵舒翹(1847—1901)赴涿州招抚义和拳,第一反应即不抱乐观,“刚、赵分途晓谕,恐仍无济”<sup>⑧</sup>,稍后即认定“刚、赵奉命宣安慰,各国哗然,知无剿意”<sup>⑨</sup>。李鸿章在地方督抚中资历最老、威信最重,其言动必为各省注目。当时安徽巡抚王之春(1842—1906)一意主剿,以为“事机已亟,计非及时痛剿,不足以张国威而弭外患”“二赤(赫德)中外情形深知窍要,而当轴固执至此,大局危及万分”,推许他“危言力谏,非公莫属”。<sup>⑩</sup>而李鸿章意态尚游移,只是推脱:

⑤ 《速寄译署》,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48页。

⑥ 《1900年6月10日赫德致粤海关税务司庆丕电》《1900年6月17日庆丕致赫德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中华书局,1983,第72—73页。

⑦ 翁飞:《试论义和团时期的李鸿章》,《安徽史学》1991年第1期。按当时北京对外电讯已中断,李鸿章电奏未及时抵京,翁文称此奏“部分击中了慈禧的心理”,而有谕令李鸿章北上之诏,不确。

⑧ 《寄上海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未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47页。

⑨ 《复江督刘(峴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49页。

⑩ 《皖抚王来电》两通,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已刻到、未刻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49、50页。

鄙人知内意主抚，电奏无益。……群小把持，慈意回护，必酿大变，奈何！<sup>⑪</sup>

他并不隐讳对北方政府的不满，也洞察到慈禧太后与亲拳势力固结之深，故屡言“时事尚可问乎，似非外臣所能匡救”<sup>⑫</sup>，“国事竟为若辈把持，外臣焦急而已”<sup>⑬</sup>，但心底清楚知道，除非上位者主动变政，否则，“外臣”绝无撼动朝局的能力。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盛宣怀（1844—1916）正积极运动，欲将昔日恩师、号为“毕生第一知己”的李鸿章推向前台。早在五月十一日（6月7日），他就试探口风：“匪不难平，但枢廷无欲平意……内乱外衅，恐非莱公还镇北门不可。”<sup>⑭</sup>李鸿章不敢轻易趟这道浑水，只平淡复以“国事大乱，政出多门，鄙人何能为力”<sup>⑮</sup>。盛宣怀对朝廷“抚议”本不以为然，对直隶地方的政治控制能力更抱怀疑，于是索性挑明：“刚、赵宣抚，恐阳奉阴违，匪势散漫难定。此事师若回北洋，似可速了。”<sup>⑯</sup>至五月十六日（6月12日），他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1830—1902）、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直截提出奏调李鸿章回任直督：

傅相督直二十五年，深得民心，目前惟有调傅相回北，内乱外衅，或可渐弭。公为封疆重臣，自应直抒忠悃，冀救万一。<sup>⑰</sup>

⑪ 《复皖抚王灼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49页。

⑫ 《复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46页。

⑬ 《寄上海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2页。

⑭ 《寄李中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文海出版社，1975，总第833页。

⑮ 《粤督李中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五，总第833页。

⑯ 《盛宣怀上李鸿章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第384页。

⑰ 《寄刘岷帅张香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五，总第833页。

刘、张二督对于“剿拳”已有共识，但一涉政治人事变动的建议，态度则不免保留。刘坤一推说“傅相还镇一节，似未便具奏”<sup>⑬</sup>，未解释原因，便轻轻带过了。

盛宣怀锲而不舍，转向京师中枢经营。五月二十日（6月16日），拟议“转危为安，化重为轻”四项办法，即“先发明谕几道：一加意惋惜（杉山彬）；一限日肃清（义和拳）；一以赈为抚；一（李鸿章）调任直督。如能四件同日而发，电传外洋，当可消弭一半，徐图因应”。据已刊盛档，此办法同时函达军机大臣荣禄（1836—1903）、王文韶（1830—1908），一则言“中堂位兼将相，处此危急存亡之秋，若犹存明哲保身之意，隐忍不言，或言之不切，恐不旋踵而奇祸临矣”，一则言“天下皆知中堂默不一言，惟其平日不言，危急之秋似不可不言”，可见二人皆被盛宣怀寄望为当时少数尚能平衡廷议的重臣。<sup>⑭</sup>次日（6月17日），盛宣怀直接致电荣禄，条陈请降明谕者四事，调李鸿章回任直督赫然在列，辞曰：“李鸿章督直二十五年，久得民心，威名素著，即调令督直，限十日到津，于平内乱及劝阻洋兵进京，必能做到。”<sup>⑮</sup>同一层意思在盛宣怀当时致另一京城友人私函中，表达得更为显白：

此事误于初十日上谕，派刚、赵安抚，耽误要事。闻抚局只不过出结敷衍面子，各匪并不肯散，二公似属上当。大局非更动政府不能转移，直督尤其误事。如调合肥还镇北洋，内乱指日可平，因其督直二十五年，深得民心，即洋兵亦可劝令勿再进京。此事关系大局，如公能封奏，转移社稷，足以传千古矣。<sup>⑯</sup>

<sup>⑬</sup> 《刘岷帅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五，总第833页。

<sup>⑭</sup> 《盛宣怀致王文韶函》《盛宣怀致荣禄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59—61页。

<sup>⑮</sup> 《盛宣怀上荣禄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90页；《寄天津荣中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五，总第836页。另见《盛宣怀条陈》，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62页。按前两个文本内容相同，应为定稿，当日寄发，“条陈”行文则略有差异，应为草稿。

<sup>⑯</sup> 《盛宣怀致徐士佳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33—334页。徐士佳，江苏江阴人，光绪三年进士，时为浙江道监察御使。

盛宣怀认为,无论派刚毅、赵舒翘安抚拳民,还是由现任直督裕禄(1844—1900)勉强任事,均属“误事”,“大局非更动政府不能转移”,而李鸿章还镇北洋则为扭转时局之枢机所在。

至五月中旬,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Edward Hobart Seymour, 1840—1929)率联军大队已由津赴京,大批拳民开始涌入京城,中外冲突骤然升级,而其时奉旨探视直隶拳众虚实的刚毅尚未回京复命。在慈禧太后眼里,义和团可用与否仍属未定,洋兵逼京却已构成现实的威胁,此时外患大于内忧。为阻止使馆增兵,她一度试图通过压制义和团来换取列强的谅解。五月十七至十九日(6月13—15日),清廷连发七道上谕,将在近畿、京城一带日益活跃的义和团民指为“拳匪”,命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巡视五城御史等“严行查拿”,同时布置兵力保护使馆、教堂。<sup>②</sup> 在外交层面,原来起到缓冲作用的总理衙门已被边缘化,不再为外国公使团所信任,被认为“他们已无力挽救局势”<sup>③</sup>。围绕洋兵进京的交涉归于失败,总理衙门的表现被视作过于软弱,也逐渐失去了慈禧太后的耐心。五月十四日(6月10日),总署大臣廖寿恒(1839—1903)遭罢免,端郡王载漪(1856—1922)受命入主总署,其外交地位愈加低落。至五月十九日(6月15日),军机处寄出谕旨:

李鸿章着迅速来京,两广总督着德寿兼署。袁世凯着酌带所部队伍迅速来京,如胶澳地方紧要,该抚不克分身,着拣派得力将领统带来京。此旨着裕禄迅即分别转电李鸿章、袁世凯,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sup>④</sup>

②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第132、133、134、136、140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第599、602页。

③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电》(1900年6月5日发自北京),《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胡滨译,丁名楠、余绳武校,中华书局,1980,第26—27页。

④ 《军机处寄直隶总督裕禄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1页。

上谕中只命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迅速来京，赴京目的为何，却无任何解释。如稍做时间排比，可发现清廷旨召李北上，尚在前述盛宣怀条陈之前。<sup>⑤</sup>有材料指证：“团匪初起时，荣相颇深忧之。五月十九日，建议召李傅相以议和，召袁慰帅以剿团，擘画周详，颇足钦佩。盖此时各国尚未决裂，大局尚可收拾。”<sup>⑥</sup>则此议发起背后，或有荣禄意见的作用。慈禧太后召李鸿章入京，意在用其外交经验和政治影响力当要冲，缓和业已绷紧的中外关系。直到此时，清廷仍不敢轻易言战，希望将中外纠纷拉回到外交解决的轨道。<sup>⑦</sup>然而形势变化之速，令人猝不及防。两天后，天津大沽口中外开战。李鸿章奉召后首次入奏，时在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表示：

奉寄谕飭鸿来京，现已料理起程。据各处探电，京城洋兵、团匪交哄，大沽炮台又失。鸿惟有单身诣阙，以赴急难，但众议非自清内匪，事无转机。仰恳宸衷独断，先定内乱，再弭外侮。鸿心急如焚，但使水陆路通，无不相机前进，仍候续奉谕旨，俾有遵循。<sup>⑧</sup>

言下之意，碍于现况无法立即动身。也就在同一天，德国公使克林德

⑤ 有论者谓李鸿章之召系荣禄推荐，“这个想法来自于盛宣怀”，但证据却为五月十六日（6月12日）盛寄刘坤一、张之洞电报。参见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298页。已如前述，此议当时未获响应。另应注意者，自五月十四日起北京对外电信完全中断，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天津—上海线泊头以北段也遭破坏（《盛宣怀致王继善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34页），如二十一日（6月17日）发电，则到京时间应更往后推。

⑥ 佚名：《综论义和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165页。其时日本外务省情报也引述了同一说法，旁证此说在当时有广泛接受度。参见《上海在勤小田切總領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北京狀況二閱スル清人ノ書簡報告ノ件》，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 別冊一・北清事變上》，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7，第92—93頁。

⑦ 张之洞闻知李鸿章内召，“喜事有转机”，也认为“既召合肥，朝廷断无与各国开衅之意”。参看《致东京李钦差》，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寅刻发，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8006页。

⑧ 《急寄军机处译署》，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7页。

(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 1853—1900)在京被害,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使馆的战斗也正式打响了。

## 二、欲走还留

至迟不晚于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李鸿章已奉到北上诏命,其致电盛宣怀说:

电召入觐。君父急难,何敢延迟,望速派妥船来粤,以便直放沽口,勿迟误。闻公将北,可同行。<sup>②</sup>

李鸿章以“君父急难”,在第一时间做出动身姿态,让在上海的盛宣怀派招商局轮船来粤,计划由海道北上,直抵大沽,并且邀盛一同入京。但随后又按兵不动,迟迟不能启程,这是为什么?

李鸿章自言“津榆路梗塞、粤人呼吁攀留”<sup>③</sup>,只道出了部分实情。内召上谕只言“迅速来京”,完全不及所召何事,也未给予任何职权,在当时确给人充分想象的空间。故李鸿章周边的戚友、幕僚皆劝以“郑重”,时人做有评论:“召此重臣而用轻轻四字,无怪人言孝钦有杀李之意。”<sup>④</sup>后来研究者也多从谕旨本意与众人解读之间的差异性入手,推论李鸿章当时的复杂心理,或谓“惧祸”,或谓“恋栈”,不一而足。事实上,李鸿章在奉召后已做出北上的具体部署,但就在此当口,发生一重大变故,导致义和团事变性质的变化,并对李鸿章行止产生直接影响。这就是大沽炮台开战。

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凌晨,大沽口列强海军与守台清军发生激战,数小时后炮台失守,至此中外之间已进入事实上的战争状态。第二天,消息灵通的盛宣怀即向李鸿章通报战况:

<sup>②</sup> 《李中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五,总第836页。

<sup>③</sup> 《寄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8页。

<sup>④</sup> 钱恂编,致之校点:《金盖樵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第8页。

“广利”明日到粤，已飭听候指挥。惟大沽炮台廿一已与各兵舰互击，炮台已失。……或稍候信，或到淞候信，乞示。<sup>②</sup>

按“广利”号，系应命派出的招商局船，原计划承载李鸿章一行北上。因情势突变，盛宣怀相应建议稍后起程，或先至上海观察时局，以为缓冲。稍后，盛又电告“伯行面商，师宜到沪”<sup>③</sup>。李鸿章长子李经方（字伯行，1855—1934）时在上海，同样倾向于父亲先到沪，再做下步打算。盛宣怀同时意识到，大沽开战后中外关系必须重新定位，李鸿章航海北上可能遇到阻力，因此提醒“须先照会各国水师提督，方能北上”<sup>④</sup>。如此，李鸿章只能接受事实，顺延动身日期，并临时修改北上路线：“现定乘‘印度皇后’船，（六月）初一午开，随员小队令搭‘广利’同至吴淞，再换‘广利’（原文如此）径赴秦皇岛登岸，间道进京。尊处得京津确信，仍随时电知。”<sup>⑤</sup>

得知开战消息后，李鸿章第一时间关心的问题，即：“大沽台、船互击，并非奉旨，各国是否作为开衅？”<sup>⑥</sup>北上已不单纯为内政问题，而演变为“国际事件”，在得到外部答复前，他不得不选择观望。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李鸿章照会各国驻广州领事称：

本阁爵大臣钦奉谕旨敕令迅速来京，先拟乘坐印度皇后船，于中历

②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申刻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4页。

③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辰刻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5页。

④ 《寄广州李中堂江宁刘制台苏州鹿中丞安庆王中丞武昌张制台成都奎制台济南袁中丞福州许制台长沙俞中丞》，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五，总第836—837页。

⑤ 《寄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5—56页。李鸿章当时计划于六月初一日（6月27日）起航，他本人乘英船，随员搭乘招商局船，至上海吴淞口短暂停留，然后再换乘北上，登岸地点避开了已为外国军队占领的大沽，而改至秦皇岛。至于进京路线，当时预备了两个方案：如津榆铁路仍通，则搭乘火车；否则配备车马，由山海关沿驿路进京，时已传知京城贤良寺和尚代搭凉棚，预备住所。参见《寄山海关宋宫保》《寄山海关炮台郑统领》，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5页。

⑥ 《寄英法德俄日本五使》，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9页。